

Teachers and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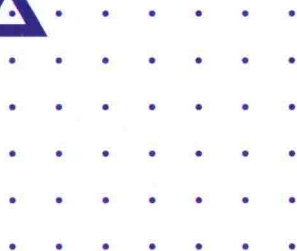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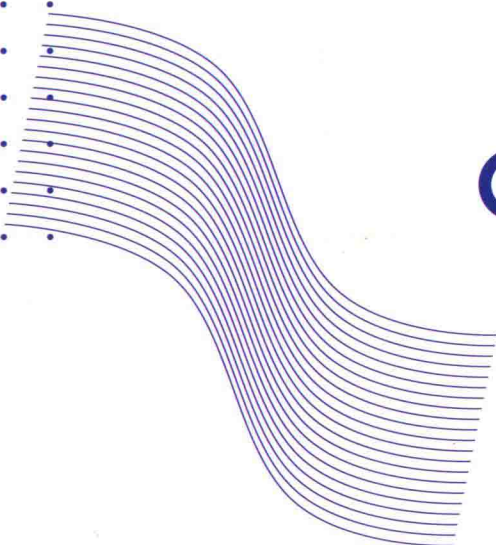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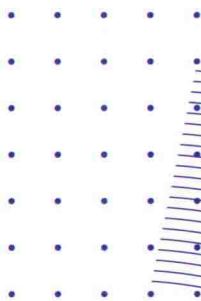


教师教育译丛

教师与文本

重思教师专业性

(美) 迈克尔·W. 阿普尔 著
杨跃 译



教师教育译丛

教师与文本

重思教师专业性

(美) 迈克尔·W. 阿普尔 著
杨跃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师与文本：重思教师专业性 / (美) 迈克尔·W. 阿普尔著；
杨跃译.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1
(教师教育译丛)
ISBN 978-7-5651-3649-8

I. ①教… II. ①迈… ②杨… III. ①教育—关系—
性别—研究②教育—关系—阶级—研究 IV. ①G40-05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0926 号

Teachers and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by
Michael W. Apple/ ISBN:978-0-415-90074-4

Copyright © Michael W. Apple 1986

Authoris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 Taylor & Francis 出版集团旗
下, Routledge 出版公司出版, 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
简体翻译版授权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并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书
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本书封面贴有 Taylor & Francis 公司防伪标签, 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10-2018-313 号

-
- | | |
|-------|--|
| 丛 书 名 | 教师教育译丛 |
| 书 名 | 教师与文本——重思教师专业性 |
| 作 者 者 | (美)迈克尔·W.阿普尔 |
| 译 者 | 杨 跃 |
| 策 划 | 戴联荣 |
| 责任编辑 | 王 艳 |
| 出版发行 |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后宰门西村9号(邮编:210016) |
| 电 话 |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
| 网 址 | http://www.njnup.com |
| 电子信箱 | nspzbb@163.com |
| 照 排 | 南京理工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京玉河印刷厂 |
| 开 本 | 787毫米×960毫米 1/16 |
| 印 张 | 17.5 |
| 字 数 | 238千 |
| 版 次 |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651-3649-8 |
| 定 价 | 56.00元 |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Teachers and Text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Education

总 序

21 世纪以来,翻译出版外国教育理论及通俗著作在我国教育出版界可谓盛况空前,林林总总的译著对促进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普及先进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等,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大量作品中,世界范围内聚焦教师与教师教育的高品质学术专著,虽亦有翻译出版,但终究显得“势单力薄”。这难道也是教师在社会中、教师教育在教育学术界处于“弱势”的宿命般的反映?我们不愿也不信!

人们常说“教师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21 世纪以来,教师教育成为我国教育研究的热点和教育改革的焦点,教师教育理论、政策研究和改革实践都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可喜态势。然而,无论是深化教育改革,还是创新教育研究,都需要走进教师的真实生活,客观、冷峻而非浪漫地关注和评价教育改革场景中所发生的一切;都需要理性地思考和认识“教育(教师教育)为什么”“教育(教师教育)为谁服务”;都需要对热闹的改革话语实践保持“头脑的清明”……为此,我们筹划了这套《教师教育译丛》。

我们期待,无论是理论深邃、论据翔实、论证严密的经典学术作品,还是图文并茂、亦庄亦谐、可读性强的学术普及著作,无论是回应诸如“教师在学校完成促进人的社会化的教育功能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等教育研究经典问题的学术作品,还是对“互联网+”新时空下教师及学校教育所遭遇的挑战及

其所引发的“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等学校社会学经典问题再度深刻剖析的“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型著作,都能够有助于中国广大中小学教师清醒地认识自身的职业生存状态、改革对自我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并深刻地思考“教师的尊严与文化使命”的问题;都能够有助于广大教师教育实践工作者和教师教育研究者清醒地认识教师专业的道德维度、教师教育的灵魂,并深刻地思考“教师教育的制度伦理”“全球化场景下的教师教育改革”等一系列问题;都能够有助于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全球视野下对教育和教师教育做出全面、深刻、细致的“全球性地思考(think globally)”,共同为在效率至上、技术至上的当下环境中将培养教师成为积极投身公共生活的反思性实践者作为教师教育最重要的目标而努力。

我们也真诚地恳请学界同人共同关心我国教师及教师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也为本套丛书出谋献策;也热忱地欢迎学界同人和我们一起继续寻找、选择和确定世界各国教师研究和教师教育研究中风格各异且品质卓越的学术著作,不断丰富本套丛书。

丛书主编 杨 跃

2018年9月

中文版序言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会被问及各种与教育相关联的尖锐问题。透过这些问题所展现出来的那份不断增进的理智以及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份决心,深深地打动着。我幸运地到过中国数所大学并且参观过许多中小学,这些经历让我受益匪浅。然而,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教育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正随着中国整体上快速地发生变革及其教育系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我由此感受到,如果现实不断地发生变化,那么,关于教育的理论也必须改写,教育所身处其中的更广阔的社会场景亦将变得更加复杂、微妙,而且更加紧密地与教育的转型关联在一起。对中国来说,是这样;对其他国家来说,亦同样如此。《教师与文本》一书回应的正是这些国内外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我们用以理解这些变革的重大理论。

为了充分地理解《教师与文本》,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历史情境中,最好是能够看到它与《意识形态与课程》(1979/1990/2004)一书的关联。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我提出教育必须被看作一项政治行动,并且建议运用“关系性思维”(think relationally)。也就是说,要理解教育就必须将其还原到更广阔社会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及其产生的剥削、宰制、屈从乃至冲突的关系之中

(当然,这些剥削、宰制、屈从乃至冲突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中,我聚焦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联,因为很明显,围绕知识、文化形式和内容以及社会记忆所生发的斗争对于任何严肃的社会转型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我们与其轻描淡写地询问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某一特定学科的知识、是否已经在太平常不过的测验中表现良好,倒不如追问一整套别样的问题:这究竟是谁的知识?它是如何变成“官方的”知识的呢?这类知识与其组织、传授方式之间是什么关系?在这个社会里究竟谁拥有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资本?谁从“法定知识”中受益而谁又无法受益?作为从事批判教育研究的学者和社会行动者,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改变现存的教育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并创造更加公正的课程与教学呢?

《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着力于分析课程和教学在文化再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我们在皮埃尔·布迪厄、巴塞尔·伯恩斯坦等人的著作中看到的有关“宰制再生产”的批判性分析传统之一。但若要更加辩证地理解知识与权力,仅此是远远不够的;要理解社会转型与斗争,也是远远不够的(参见 Weis, McCarthy & Dimitriadis, 2006)。

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另外两本书——《教育与权力》(1982/1995/2012)和《教师与文本》(1986)。《意识形态与课程》和这两本书共同构成了人们所说的早期“阿普尔三部曲”。这两本书纠正了《意识形态与课程》中的某些错误、弥补了一些不足,将对权力之动力因素的分析拓展到“性别”和“种族”(亦可参见 Apple & Weis, 1983);不仅聚焦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与复杂的再生产动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聚焦于权力与学校内外的抵制、斗争、冲突、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批判性地审视了课程内容与形式以及经历了去技能化、再技能化和工作强度加剧等过程的教师劳动中所发生的一切;阐明了“真正的”学校课

程——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并且分析了发生“反霸权行动”的可能空间之所在。

这套“三部曲”进一步拓展了我对社会、文化再生产所进行的新马克思主义分析(这种分析深受葛兰西、威廉姆斯、阿尔都塞以及诸如“霸权”“过度决定”等概念的影响。亦可参见 Apple, 1982/1995/2012),将对主体能动性和文化再生产的政治、经济动力(并不罗曼蒂克)的强调进一步整合在一起,将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包括性别、种族在内的更大范围)的政治、文化斗争联系在一起,从而弥补(但绝不是放弃)了我之前仅仅关注“阶级”的不足。它们为我之后持续不断围绕“权力运动及其联盟如何能够快速改变教育政策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以及社会范围内的宰制与屈从关系”所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奠定了基础(但并非是我们许多人所可能认为的那种“伦理上或政治上合理”的分析路径)(参见 Apple, 1996, 2003, 2001/2006, 2010, 2013; 亦可参见 Apple & Buras, 2006; Apple, Au & Gandin, 2009; Apple, Ball & Gandin, 2010)。

不仅如此,这几本书还为在实践中开展批判性民主教育奠定了基础(参见 Apple & Beane, 2007)。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深深扎根于文化斗争中,渗透在学校、课程、教师、社区在这些斗争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里。

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与文本》不仅仅源自一系列理论的、实证的和政治的讨论,而且深刻地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相关联。我来自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就读于一个工人阶级贫困社区的学校,后来成为更大范围的贫困社区的一名教师。我在城乡地区中小学任教的那些岁月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这些经历也让我对教师在政治、媒体和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充满担忧。在更广阔的社会中,教师过去和现在通常都是没有尊严的。虽然我的同事们和我不断地付出辛苦而艰巨的劳作,但我们和许多教师过去和

现在都常常因我们完全无法操控的大量社会问题而受到谴责；其中，我们过去和现在被要求去传授的课程并没有与我们学生的日常生活、现实情境及文化特质联系在一起。《教师与文本》一书就是我对教师身处其中的这些困境所做出的一部分回应。我并非想宣称所有的教师都是完美的，亦非想否认在许多国家中教师教育是能够也应该得到改善的，但是，我确实想强调应该对城乡地区教师所面对的现实给予尊重和理解，想强调现实中教师劳动和课程是什么样的、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以及我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使其得到实质性的改善。如果没有这份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听不到教师的声音，我担心我们致力于改善现状的努力终将付之东流。

这本书也是我公开表达批判教育学者使命的一本书。在《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Apple, 2013)一书中，我进一步详细探讨了这些使命，但其中好些想法早在你正在捧读的这本书中就已经初现端倪。

《教师与文本》在中国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它弥补了我虽有很多作品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却唯独缺少这一本的巨大遗憾；更重要的是，它为严肃对待教育内外的社会性别、女性生活等议题（这在中国已是一场生机勃勃的运动）提供了支持。此外，在世界范围内，批判性地检视出版物中的各种关系、出版业中的权威关系及其政治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有力。有关出版过程及其政治性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加充分、全面地看到，在美国及其他国家中知识是如何成为“官方知识”的，并且与中国的现实情形加以比较。

正如我在其他作品的中译本中说过的，读者不是作者言语的被动接收者，读者在与作品的互动中产生自己的意义解读。我希望你通过和我的文字之间的交流，所获得的意义将有助于你更加坚实地理解你自己所身处的情境。

最后，让我在公开的场合向本书的译者杨跃所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她

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与我合作共事一年,我很快就发现她是一位聪慧、善思且非常执着的学者,我对这样的学者充满敬意。也请允许我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感谢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教育及其他重要领域的著作。

迈克尔·W.阿普尔

参考文献:

迈克尔·W.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纽约:劳特利奇,1979/1990/2004)。

迈克尔·W.阿普尔主编,《教育中的文化与经济再生产》(波士顿: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有限公司,1982)。

迈克尔·W.阿普尔,《教育与权力》(纽约:劳特利奇,1982/1995/2012)。

迈克尔·W.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纽约:劳特利奇,1993/2000/2014)。

迈克尔·W.阿普尔,《文化政治与教育》(纽约:教师学院出版社,1996)。

迈克尔·W.阿普尔等,《国家与知识政治学》(纽约:劳特利奇,2003)。

迈克尔·W.阿普尔,《教育的“正确”之路——市场、标准、上帝和不平等》(第2版)(纽约:劳特利奇,2001/2006)。

迈克尔·W.阿普尔主编,《全球危机、社会公正与教育》(纽约:劳特利奇,2010)。

迈克尔·W.阿普尔,《教育能够改变社会吗?》(纽约:劳特利奇,2013)。

迈克尔·W.阿普尔、比恩·J. A. 主编,《民主学校:赋权教育的经验》(第2版)(朴茨茅斯:新罕布什尔州,2007)。

迈克尔·W.阿普尔、比勒斯·K. L. 主编,《被压迫者的声音:课程、权力与教育斗争》

(纽约:劳特利奇,2006)。

迈克尔·W.阿普尔等主编,《批判教育学劳特利奇国际手册》(纽约:劳特利奇,2009)。

迈克尔·W.阿普尔、威斯·L.主编,《学校教育中的意识形态与实践》(费城:特普尔大学出版社,1983)。

迈克尔·W.阿普尔等主编,《教育社会学劳特利奇国际手册》(纽约:劳特利奇,2010)。

威斯·L.等主编,《意识形态、课程与新教育社会学:重温迈克尔·W.阿普尔的著作》(纽约:劳特利奇,2006)。

致 谢

《教师与文本》延续了我在《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两本书中所体现的研究理路,三本书构成的系列著作均旨在探寻正式教育制度中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以及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探寻对于了解我们的正式教育制度、主流教育政策及其实践运作是至关重要的,但却往往被一种认识所引导,那就是(在很多情形下,通过大量的努力工作)教育能够成为一项解放的事业。在美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中小学学校里,人们一直在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建构和重构教育制度。当然,为了使这种建构与重构的努力能够产生持久的效应,这些行动需要与一系列“关系性分析”(学校教育及组成我们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等之间的动力机制关系)紧密联系起来。因此,我的上述“三部曲”著作都是聚焦于分析学校教育是如何生产、再生产、协调和转化政治、阶级、文化权力的。通过仔细剖析这些关系并对这些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我希望能够展示出受政治所影响的教育行动的局限性和可能性。

幸运的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以及其他地方,有为数不少的一群人都在严肃地思考这些议题,与他们的交流和讨论让我受益匪浅。虽然要列出对一本书的写作给予过实质性帮助的或者曾经帮助过一个人澄清自己思想的人员名单,注定会非常长,但总还是会有一些人给予过一个人所需要的全部重要评价。在这些人中,有桑德拉·阿克(Sandra

vi

vii

Acker)、菲利普·奥特巴克(Philip Altbach)、吉恩·安扬(Jean Anyon)、哈瑞·阿普尔(Harry Apple)、曼德林·阿诺特(Madeleine Arnot)、理查德·柏茨(Richard Bates)、戴维·巴瑞科(David Bathrick)、安·贝克(Ann Becker)、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兰登·贝叶(Landon Beyer)、宓·布洛克(Mimi Bloch)、马丁·卡诺(Martin Carnoy)、约翰·科德(John Codd)、鲍勃·肯奈尔(Bob Connell)、罗杰·戴尔(Roger Dale)、伊安·戴维(Ian Davey)、米瑞安·大卫(Miriam David)、吉安·德(Gwyn Dow)、利兹·艾斯沃斯(Liz Ellsworth)、玛瑞纳·恩吉塔(Mariano Enguita)、吉恩·厄德曼(Jean Erdman)、荣德·弗恩斯(Rod Fawns)、沃尔特·费恩伯格(Walter Feinberg)、萨拉·弗里德曼(Sara Freedman)、荣德·吉尔伯特(Rob Gilbert)、迈克·金斯伯格(Mark Ginsburg)、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安德鲁·吉特林(Andrew Gitlin)、林达·戈登(Linda Gordon)、艾伦·哈特(Allen Hunter)、莱斯莉·约翰逊(Lesley Johnson)、卡尔·卡斯特(Carl Kaestle)、盖尔·凯丽(Gail Kelly)、赫伯特·克雷巴德(Herbert Kliebard)、理查德·拉克曼(Richard Lachmann)、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阿兰·劳克伍德(Alan Lockwood)、巴里·麦克唐纳德(Barry MacDonald)、琳达·麦克尼尔(Linda McNeil)、芭芭拉·米罗仕(Barbara Melosh)、阿力克斯·莫尔纳(Alex Molnar)、彼得·马斯格雷夫(Peter Musgrave)、罗伊·纳什(Roy Nash)、弗雷德·纽曼(Fred Newmann)、玛丽·奥布赖恩(Mary O'Brien)、迈克尔·奥尔涅克(Michael Olneck)、保罗·奥尔森(Paul Olson)、加里·普瑞斯(Gary Price)、彼得·瑞姆齐(Peter Ramsey)、马尔库斯·瑞斯金(Marcus Raskin)、威廉·瑞茜(William Reese)、阿兰·瑞思(Alan Rice)、斯蒂芬·赛尔登(Steven Selden)、道格拉斯·思朗(Douglas Sloan)、罗宾·司默尔(Robin Small)、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乔纳斯·索尔蒂斯(Jonas Soltis)、安迪·司泊乐(Andy Spaul)、安·斯托勒(Ann Stoler)、迈克

尔·史翠贝尔(Michael Streibel)、马丁·苏利文(Martin Sullivan)、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乔尔·塔赛尔(Joel Taxel)、加里·维拉格(Gary Wehlage)、洛伊丝·魏丝(Lois Weis)、菲利普·韦克斯勒(Philip Wexler)、杰夫·惠蒂(Geoff Whitty)、安·威尔森(Ann Wilson)、埃里克·欧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和肯尼斯·蔡克纳(Kenneth Zeichner)。

本书中的许多想法主要在以下三个场合首先公开表达。

第一,我们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持续至今的“周五研讨会(Friday Seminar)”。这个团队提供的政治与智识氛围对于发展教育批判研究十分必要,要特别感谢过去和现在的研讨会参与者,其中包括:浅昭茂(Shigeru Asanuma)、凯瑟琳·卡西(Kathleen Casey)、崔元(Won Choe)、琳达·克里斯蒂娜·史密斯(Linda Christian-Smith)、埃斯特班·德拉托瑞(Esteban de la Torre)、凯瑟琳·丹士摩(Kathleen Densmore)、格伦·哈达克(Glenn Hudak)、戴维·赫什(David Hursh)、苏珊·荣科(Susan Jungck)、金基硕(Ki Seok Kim)、帕特·克鲁格(Pat Krueger)、玛戈特·拉尔森(Margot Larson)、丹·里斯特(Dan Liston)、卡梅伦·麦卡锡(Cameron McCarthy)、苏珊·诺弗克(Susan Noffke)、朴复权(Bukwon Park)、约兰达·罗哈斯(Yolanda Rojas)、莱斯利·罗特豪斯(Leslie Rothaus)、肯尼斯·泰特尔鲍姆(Kenneth Teitelbaum)和邦尼·鲁德尔(Bonnie Trudell)。

第二,我作为访问教授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和西班牙的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期间,这两所大学的师生以及墨尔本和马德里的教师联合会领袖、教育部官员、州教育委员会成员都对我修正自己的思想给予了极大的帮助。

第三,我多年来与麦迪逊及其他地方的许多进步主义教师、教育行政人员、课程工作者的交流。他们为建设和捍卫既具有教育价值又具有政治意义的真正的教育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常常是在条件非常艰苦和任

务相当艰巨的环境下——给予了我力量,让我对美好的教育未来充满信心,并不断地提醒我:这样的教育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可能的。如今,这样的信念弥足珍贵。

还有很多人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重要的支持。感谢劳特利奇与基根·保罗有限公司(Routledge & Kegan Paul)的斯特拉特福德·凯迪克(Stratford Caldecott)和鲁伯特·保罗(Robert Paul)向我们展示了专业编辑和出版人的素质。感谢戴安娜·福克纳(Diane Falkner)细致而专业的文稿录入工作。感谢乔伊斯·香克斯(Joyce Shanks)、皮特·阿普尔(Peter Apple)和保罗·阿普尔(Paul Apple)为文稿校对及其他大量工作所付出的辛劳。

最后,要感谢对本书产生最重要影响的瑞玛·阿普尔(Rima Apple)。她一直是对我的思想进行批评的最敏锐者,她的评论并不是让我轻易地放弃我的思想,而是使我重新认识我所想表达的思想的重要意义之所在。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守的信念,也都钟情于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这种情形必然要求爱、耐心、关怀乃至牺牲。最重要的是要有相互间的尊重。瑞玛(Rima)显然具备所有这一切。我把本书献给她。